

东 陆 书 院 文 从



# 殷光熹文集

第一卷 诗经论丛 诗骚并辉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东 陆 书 院 文 从

# 殷光熹文集

第一卷 诗经论丛 诗骚并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殷光熹文集. 第1卷, 诗经论丛、诗骚并辉 / 殷光熹著.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5  
(东陆书院文丛)  
ISBN 978-7-5482-2495-2

I. ①殷… II. ①殷…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②《诗经》—诗歌研究 IV. ①I217.2  
②I207.2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86779号

出品人: 周永坤  
策划编辑: 柴伟  
陈曦  
责任编辑: 李兴和  
责任校对: 严永欢  
责任印制: 张爱成  
装帧设计: 刘雨



东 陆 书 院 文 从

# 殷光熹文集

## 第一卷 诗经论丛 诗骚并辉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 昆明市五华区教育委员会印刷厂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37.75  
字 数: 510千  
版 次: 2015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2-2495-2  
定 价: 96.00元

社 址: 昆明市翠湖北路2号云南大学英华园内  
邮 编: 650091  
电 话: (0871) 65031070 65033244  
网 址: <http://www.ynup.com>  
E-mail: [market@ynup.com](mailto:market@ynup.com)

## 《东陆书院文丛》前言

书院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书院之名，肇始于唐代，最初为私人的书房。后来官家设书院（唐玄宗开元十三年即725年，丽正修书院改名为集贤殿书院），负责刊辑经籍、搜求遗书、辨明典章。这是官方的修书馆加上图书资料室。唐末至五代，战乱频仍，官学衰败，许多读书人避居山林，模仿时已兴盛的佛教讲经制度创立书院。书院于是成为中国古代特有的文化教育形式之一，兼有藏书、教学与研究三种功能。书院在宋代高度发展，江西白鹿洞书院、湖南岳麓书院、河南应天府书院和嵩阳书院四大书院，盛极一时。明清两朝，民间书院与官办书院广为分布，对推动全国的文化教育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书院形式也传播海外，特别在东亚、东南亚所谓的儒家文化圈内，更著影响。

晚清，在西方坚船利炮的攻击下，封建帝国走到末路。革故鼎新的呼声高涨，科举制度废除，各级书院也都分别改为大、中、小学堂，传统的书院不复存在。

但在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中，由于担忧传统文化的湮灭不彰，

钱穆先生于 20 世纪中叶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是为香港中文大学前身。在大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的发展与文化重要作用的日益显现，又掀起了读诵经典，践行传统文化的热潮。全国各地纷纷恢复重建或新建书院，旨在续接文脉，振兴国学。

云南大学的前身是东陆大学，创办于 1923 年。云南大学东陆书院成立于 2013 年，时为学校创立 90 周年之际。书院以弘扬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秉承东陆学术精神，涵养博雅学术品性，“会泽百家，至公天下”，致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与发展为宗旨。本着这一宗旨，设立《东陆书院文丛》（以下简称《文丛》）。《文丛》主要收录东陆书院组织取得的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相关研究成果，既注重知名学者的学术积累，也关注成长中青年一代学人的学术创造。

《文丛》的出版得到众多的专家学者的帮助支持，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希望《文丛》得到读者的批评指正！

《东陆书院文丛》编辑委员会

2015 年 3 月

# 序

施惟达

殷光熹先生是我的老师，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给我们上中国古代文学唐宋段。那时殷先生正值壮年，在云南大学中文系里还属于中青年教师。刚刚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教师与学生都同样充满对知识的渴望，特别中青年教师，常常边学边教。而七七级、七八级两界学生，大多有过相当的社会阅历，因此老师和学生的距离很近。殷先生对学生非常平易，课余时常对学生嘘寒问暖。对教学，殷先生态度则异常认真、严谨，尽心尽力要把自己的所知所感都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这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殷先生 1933 年 9 月 6 日出生于浙江杭州。父亲是江苏江阴人，上海东南医学院毕业后在杭州做医生。母亲是杭州人，读过女子中专，也从事过医务工作。日寇侵华期间，殷先生举家南逃，辗转安徽、江西、湖南、贵州等地，历尽艰辛，最后来到云南，落籍昆明晋宁。1950 年，云南刚解放，殷先生中学毕业。这位在学校是品学皆优的好学生，毕业前夕还被推举出席

云南省的学代会，应顺理成章继续进入大学深造，然作为长子，下面还有四个年幼的弟妹，家庭经济颇为拮据。为与父母分忧，殷先生只有放弃学业，进入刚成立不久的云南省人民政府成为一名工作人员。在政府的九年间，殷先生由办事员、科员、科负责人而机要秘书、材料秘书，一步步得到提拔重用。三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一次被评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并于参加工作不久的1952年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用今天的眼光看是仕途一片光明。无奈殷先生自幼喜爱文学，虽身在机关工作而不改初衷，于是政府中少了一名大多会是平庸的官员而学校里多了一位优秀的学者。

早在中学时期，殷先生就读过不少中外文学名著，希望将来能当作家。虽然未能如愿进入大学，但干一行努力一行的同时，他的大部分业余时间都用在阅读文学作品和练习写作上。此间还在报纸和广播电台发表过诗歌、散文、小说。至1959年，大妹妹已经大学毕业，殷先生毅然决定重考大学，选择的是云南大学中文系，结果如愿以偿。大学时期的殷先生更加发愤读书，勤于笔耕，从大学一年级开始就陆续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毕业后，殷先生以优异的成绩留校任教，分配在古典文学教研室，从此开始了他的教学生涯。听课、备课、讲课、写论文，成了殷先生的生活常态。不久，殷先生《关于孙悟空反抗的性质和目的》等两篇文章发表于《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副刊，成为云南大学崭露头角的年轻助教，受到李广田校长的口头表扬，旋即成为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可惜好景不长，随之就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殷先生这样的学术新锐自然不能幸免。批斗、抄家，所有个人的资料、手稿都被悉数拿走，不知所终。一切教学科研活动都陷于停顿与灾难之中。国家与民族

的十年浩劫啊！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学校逐渐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宣告“文化大革命”路线在高等教育的终结。殷先生又可以重新回到心爱的事业了。压抑了十年，耽误了十年，殷先生以加倍的热情和刻苦精神全身心投入到教学科研中。没有周末，没有节假日和寒暑假，每天十六七个半小时的工作时间，读书、备课、讲课、写作，家、讲台、图书馆，周而复始，直至退休后的若干年里。殷先生上课带学生到2004年71岁高龄，此后，虽然不再上课带学生，但殷先生一如既往地保持着读书和写作的习惯又十余年。数十年来，这已经成为殷先生的生活方式了。几年前，殷先生的老伴开始卧病在床，于是殷先生又担负起照顾老伴及家庭中的里里外外所有大事小情的烦重任务。然而这并没有阻断殷先生的研究写作。在把所有的俗务料理完之后，殷先生仍然平心静气坐到灯下，在书桌上展开他的书，提起他的笔，回到他熟悉的精神世界中。至今，殷先生已经83岁的高龄了，仍然未改其乐。

殷先生的学术造诣表现在诸多方面，比较突出的，集中于《楚辞》研究、宋词研究、文学赏析几个方面。1979年，殷先生受教育部委派，赴杭州大学师从国学泰斗姜亮夫教授治《楚辞》。一年后，殷先生的结业论文《屈原思想流派辨》被姜亮夫赞为“能于细微处着手，于纲要处下功夫。举凡遮拨诸家建立屈子（之说），皆能一针见血，无空言，无漫语，是一篇辨章学术的好文章”。此后，殷先生专注于《楚辞》研究，发表了一系列相关论文和著作。其著作《楚骚：华夏文明之光》《楚辞注释》（合著）、《楚辞论丛》《诗骚并辉》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而前者更获当年出版的全国屈学研究成果一等奖。

奖，殷先生被学界称为姜亮夫先生楚辞学的优秀弟子之一，成为全国著名的楚辞学研究专家。在宋词研究方面，以《宋词探美》《唐宋名家词风格流派新探》等著作为代表，对宋词的风格流派及各家的文化精神、风格特色、艺术技巧等作了深入开掘，表现出作者新的研究意识和研究方法，有纲有目，点面结合，上下勾连，纵横比较，一气贯通。作者针对明代以来对宋词风格所作的“婉约与豪放”两分法的定论，明确提出宋词中的婉约与阴柔之美、豪放与阳刚之美、清雅与中和之美三种风格类型。并以姜白石为清雅派的代表人物。殷先生的论述辨析入微，既注重“类型风格”，又探索“个性风格”，将风格流派的同和异研究有机结合在一起，被学界评为研究唐宋词风格流派的创造性论著。另外，殷先生充分运用自己对《楚辞》和宋词都有深入研究的特长，承接前辈学者的足迹，从新的理论视野与具体表现形态探视《楚辞》对宋词的影响，或说宋词对《楚辞》的继承发扬，把传统的研究推向新的高度。在文学赏析方面，无论是对《诗经》、宋诗乃至莫泊桑的短篇小说的赏析，都形成专著问世。其中有的篇章被选入中学语文参考书中。有学者总结其赏析文章的特点是深刻的识见、细腻的诗心、优美的语言。

综观殷先生的治学特点，一是厚基础，善汲取。殷先生在读书期间就是一名勤奋刻苦的学生，至今仍毫不倦怠，勤奋不息，其精神令我们这些学生辈汗颜。其研习面之广，举凡文学史、作家作品、文字、训诂、音韵无不涉及。一般人，没有厚实的古文字基础，是不敢去碰佶屈聱牙的《诗经》特别是《楚辞》的，更遑论去研究它，殷先生却能遨游于其中，旁搜远绍，寻坠绪之茫茫。而且殷先生对读到的东西有大海不捐细流

的气度。一次殷先生跟我说，他读到我的一篇什么小文章，很欣赏其中的几句，还把它抄下来。我对此简直惊诧万分，敬佩无比。

二是高处着眼，低处着手。针对自己的研究课题，前人做过什么，现在又进展到什么程度，只有高处着眼，才能了然于心，找到自己的研究方向和选题。而要进行具体的研究，又不能大而化之，持凿空之论。殷先生的研究总是追索本领域的学术前沿，善于发现有价值的研究题目，然后又能把它具体化，落实为一个个的问题。这些研究题目甚至是系列化的。例如在《楚辞》与宋词这两个领域中，殷先生选取了有代表性的屈原与辛弃疾，采用“一网打尽”的方法，系统探讨辛词与屈骚的关系，做出有影响的研究成果。

三是知难而上，勇于创新。《楚辞》中的《招魂》和《大招》作者究竟是谁，可谓一桩千古悬案。有说是屈原，有说是宋玉（《招魂》），有说景差（《大招》），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殷先生在把“二招”的内容同当时的时代背景及某些历史事件联系起来进行一番周详细致的考证后令人信服地指出，二者皆出自屈原之手，从而解决了一段文学史的悬案。

当然，所有这些，都离不开踏实的作风。殷先生的踏实做学问可举一例。1996年，殷先生受张文勋先生委托，整理点校《淮南鸿烈集解》。《淮南鸿烈集解》是国学泰斗刘文典先生的遗著，是刘先生晚年一直致力的重要著作，惜当时频仍的政治运动，终未将之完成，许多内容还是刘文典先生写于纸条上夹在原书。整理点校既需要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又需要十分的耐心和踏实作风，否则难于完成或难于高质量完成。虽然这本不在殷先生的专攻范围之内，但殷先生仍然愉快地应承下来，

并花了整整两年时间完成了这项工作。文勋先生对此十分满意。经殷先生整理点校、文勋先生审定的这部著作最终收入《刘文典文集》，由安徽大学出版社与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并得到李学勤等国内知名学者的高度评价。

殷先生年迈八旬，颊削齿豁，衣着简朴，但面有红色，步履稳健。虽不声若洪钟，而气息厚实。每日仍孜孜矻矻，汲汲于学问。想起韩文忠公的自画：“沉浸醽醁，含英咀华，作为文章，其书满家。”殷先生差可当之。

我与殷先生日常交往并不密切，但殷先生每每有大作赠我，必定认真拜读，从中获益良多。作为学生，总想为老师做点事情。恰逢“东陆书院文丛”成立，又得学校有关领导的支持，于是把殷先生的文集列入其中，由此把殷先生分散的著作统一集合在一起，于学界，于读者，都不失为一桩好事。殷先生亦愉快应之，并嘱我写序。我于殷先生闳中肆外的学问何敢望其项背，遑论为殷先生文集写序，然师命不可违，挂一漏万拼凑出上面一些文字，算是学习的体会罢。

2015 年 10 月于东陆书院

## 自序

### 一

我1950年底中学毕业后就参加了工作，九年后的一个夏天，我决定考大学继续深造，转向文学事业。说来也算幸运，起初我提出报考大学的申请未获单位主管领导批准，后在处长的支持和帮助下，终于说通了主管领导，同意我去考大学，还给我一个月的复习时间，并告诉我：如果考得上大学就去好好读书深造，如果考不上大学就回来安心工作。领导的开明通达，让我吃了颗“定心丸”。于是，我就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复习，晚上也不回宿舍，用棉大衣当被子，在沙发上或靠或睡，度过紧张的一个月。功夫不负有心人，我被录取在云南大学中文系少数民族文学专业，开学后系领导又将我调整到汉语言文学专业。

我参加九年工作后又来读大学，难免会有人误认为我是仕途不顺所致。其实并非如此，如果要看我工作期间的表现，也

可以说是一帆风顺，入伍不到两年就入党入党，后又多次得过先进工作者、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等奖励，从办事员、科员到科负责人、机要秘书、材料秘书，接下来再升职并非不可能。可是，当时我确实没有往仕途上发展的想法，而是念念不忘要走文学事业这条道路。当时，除了搞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外，几乎全部业余时间都放在阅读文学作品和练习写作上，还发表过作品，更增强了自信心，想来想去，我总觉得从文学事业方面去发展更符合自己的愿望和旨趣，于是，决定弃政从文，结果如愿以偿。

进入大学后，有段时间调干金停发，经受着“穷”的压力，好在得到原单位的关心，给过我补助，又得到个别老同学的救急资助，能够维持温饱。不久，又恢复了调干金，并补发了过去未发的部分，总算平安度过了三年困难时期。像我这样的调干生各个年级都有，一般而言，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锻炼又来读书，懂得珍惜这次深造机会，自觉钻研，提高会快些。我在本年级同学中算是学长，理当要求自己像个学长的样子，何况经过组织的多年培养教育，懂得自己该起什么作用，因而在读书期间，曾被评为品学兼优的“三好生”。从学习成绩看，四年当中各门课程的期末考成绩，在我的印象中，除一门未得“优”外，其余均为“优”等。

“文化大革命”前中文系的课程，学时最多的是中国古代文学史课，要学三年半时间，而师资力量最强的教研室要算古典文学教研室。这对我来说是个难得的机遇，不能轻易错过。比如学好刘尧民先生的《诗经》研究课、《楚辞》研究课。我的毕业论文就是在他的指导下完成的，成绩为“优”，且在我的毕业论文中某些段落用朱笔画了若干个双圈（表示赞赏）。

又如张文勋先生的中国古代文论课，除了认真听讲外，还在课余时间读过陆机、钟嵘、刘勰等人的经典著作，又及时拜读过先生在当时发表的一系列论文（如形象思维研究系列论文等）。关于中国古代文论课作业，我做的题目是：《简谈程颐的文道观与宋代学派之间的分歧》，后来发表在《昆明师范学院学报》上。可以说，张先生的教学和科研成果，对我后来从事文学研究工作产生过长期的影响，故心存感激和敬意。只要他派给我任务，都会尽力完成，如1979年首届全国古代文论研讨和教材编写会议在昆明召开时，他邀我参加大会工作，并指定由我在《思想战线》上报道会议情况和向与会十位专家约稿（后在该刊物上发表）。又如邀我整理、校点刘文典先生的遗著《淮南鸿烈集解》一书，我当即放下其他研究，将重心转到此书上，在他的指导下，用了两年的时间完成了任务，于1998年8月公开出版。

作为一个大龄学生的我，懂得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遇，因此，凡是自己选定的课程都要争取学好，就以张为祺先生所上的工具书课、文选学课为例：他上课时，常常要求学生学会查工具书。有一次，他在课堂上问：查过工具书的人请举手。当时我正低头翻阅刚发的讲义，应声举手，不料全班只有我一个人举手，先生问了我的名字后叫我坐下，等我回过神来，觉得很不好意思。文选学课期末考成绩我得了个“优”，还得到先生的表扬，特别称赞试卷中有关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旨》的论述。又如外国文学课，我所做的作业被老师看好，被贴在教室里让大家阅看。这些鼓励，促使我更加努力。

然而遗憾的是，当我读到四年级上学期时，因患重感冒时又去冲凉水澡，使病情加重，得了哮喘病，呼吸困难，不能平

睡，备受折磨，形容憔悴，只好休学一年。休学期间，一种求生的欲望迫使自己病急乱投医，不论是西药、中药还是草药，只要是医生开的药，来者不拒，最后病被治好了，却不知道应感谢哪位医生。大病脱险，颇有“重生”之喜。病愈后，我回校复学，原来只差一学期就毕业，现在又得从四上开始，再读一年。也就是说，我从进大学到毕业，实际上是读了四年半的书，于1964年秋季毕业，被分配在本校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当助教。之后，边听老教师讲课边备课，讲稿写好后要交教研室讨论，通过后先试讲，然后才能正式走上讲台，不久又被任命为教研室副主任。1966年夏初，我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副刊上发表了两篇文章，还得到李广田校长的口头表扬，随后又成为校学术委员会成员之一。然而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倒霉的日子也随之降临，挨批斗、被抄家，个人积累的资料和习作（如小说、电影剧本手稿）至今不知去向，想必早就“灰飞烟灭”了。那时，整个中国都处在混乱与动荡之中，岁月蹉跎，年轻时的宝贵时光被白白浪费了，何处是归途？一片茫然。

## 二

“四人帮”垮台后，学校开始复课，教学秩序逐渐得到恢复。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人们总结了历史经验和教训，人际关系逐渐得到改善，使学习、工作和生活逐步走向正常化。我有幸重操旧业，为了弥补过去失去的时间，发愤读书，刻苦钻研，认真备课，先后上过多门基础课和选修课。20世纪70年代末，学校送我到杭州大学进修，在姜亮夫先生的直接指导下

学习《楚辞》，回校两年后开了“楚辞研究”课。1984年开始招收研究生。在我指导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毕业论文中，也有若干篇（或著作）得以公开发表，如张仁福的《中国南北文化的反差——韩愈与欧阳修的文化透视》一书，在学界产生过较大影响，不仅再版，后来还被收入“云南文库”中的“当代云南社会科学百人百部优秀学术著作丛书”之中。

为教育事业贡献力量，是我报效祖国的心愿。我自在大学任教以来，一直是在教学第一线工作，既上基础课又上选修课和专题课（同时还兼任过一些社会工作）。曾三次获得云南大学教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一次获云南省教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现将我所担任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情况简述于后：

### （1）中国古代文学史课

这门基础课在中文系课程中课时最多，但教学内容的更新迫在眉前。过去所使用的教材，一般都是按朝代、按作家年代顺序来讲的，虽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难以看出各种文体本身的发展线索、特点和规律。针对这种情况，我试着做些改进，即按时代、按文体来讲述文学史，既从纵的方面讲，又适当加强横向联系和比较。注意阐明社会发展、时代文化思想与文学发展的联系和区别。既讲各种文体本身所具有的共同风格特征，也讲各个作家在运用各种文体创作时所体现的个性特征和风格特点，并对文学史上各种风格流派作了分析比较，使课程内容的覆盖面宽一些，角度新一些，看法深一些，让学生在了解各种文体发展情况的基础上来把握总的文学发展情况，又在总的文学发展史的观照下把握各种文体的发展轨迹。又如旧教材对作家、作品的分析与评价，讲到思想内容时，往往有一套模式，诸如同情人民疾苦，揭露统治者罪恶，或是人民性、局限性之

类。讲到艺术性时，不外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或是语言精练、结构严谨、风格清新之类。至于在艺术性方面作进一步地发掘、提炼、分析和概括，或曰薄弱，或曰空白。我在不偏离文学史基本知识体系和概念的原则下，力求从新的观点、方法和角度，来叙述、阐明文学发展过程、文学现象、特点和规律等。重视艺术经验的介绍、分析、提炼、概括和总结。注意从文化的角度审视古代文学：或将古代文学放在文化大背景下进行透视和观照，或将古代文学放在艺术文化中加以考察。又注意运用一些相关学科知识（如文艺美学、文艺心理学等），多角度、多层次地进行梳理分析和阐释某些文学现象及作家、作品等。或对某些“热点”“难点”，从新的角度加以阐释。

由于我在这门课上花了较大精力，又经多次实践和提高，因而在教学质量上逐步得到提高。学生反映良好。

## （2）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

入选作品以各个时期各种体裁的重要作家作品为主；以思想性和艺术性结合较好的作品为选择标准；多选久经传诵的名篇，同时注意作品题材的广泛性、风格的多样性和知识的丰富性。我将作品大体分为两大类：一是讲授的；二是自学的。作品既按时间顺序讲，又按文体样式讲。每讲一个时代的作品前，对各种文体的源流、演变和特点等情况作个简要综述。针对学生在古典诗词曲方面基础知识薄弱的情况，我在授课中除了结合作品讲过一些这方面的知识外，还利用辅导时间比较系统地讲过这方面的知识。这门课，我主要抓了三个环节：一是提高文言文的阅读能力。这是解决本课程基本功训练的首要问题。二是提高分析能力。这是运用文学基本理论知识的核心问题。三是提高鉴赏水平。这是训练综合知识运用能力的一个重要